

<<中国文脉>>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国文脉>>

13位ISBN编号：9787535461964

10位ISBN编号：7535461964

出版时间：2012-11

出版时间：长江文艺出版社

作者：余秋雨

页数：425

字数：360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中国文脉>>

内容概要

此书是继《文化苦旅》之后，余秋雨教授最重要的作品，也是当今中国当代文史领域最重要的作品之一。

余秋雨教授感叹当前“文脉既隐，小丘称峰；健翅已远，残羽称鹏”，因此以这部重大的开创性著作来提醒和弥补。

中国文脉，就是指中国文学几千年发展中最高等级的生命潜流和审美潜流。

本书以中国文字起源为引，从《诗经》讲起，到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及楚辞，再到秦汉时期的大一统与书同文对文学的影响，汉赋及“无韵离骚”《史记》，魏晋时期的三曹及“竹林七贤”等文人雅士的诗作文采，再到唐宋诗词，元曲及明清小说，一气呵成，使历史与现实相沟通，文理与形象相交融，为广大读者解读了中国文化的演化过程。

第一核心篇目《中国文脉》，酣畅地通论了三千年中国文学的精神主脉和美学主脉。

此前从未发表过；此书第二核心篇目《笔墨历史》，也酣畅地通论了作为文脉载体的三千年中国书法史。

此前均从未发表过。

在这两个核心篇目之后，是对每个时代文脉的精细论述，组成了一部罕见的《中国文化人格史》和《审美精神流变史》。

其中不少文章，已成当代经典。

<<中国文脉>>

作者简介

余秋雨一九四六年生，浙江人。

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经由教育文化界的多次民意测验和专家推举，成为当时中国大陆最年轻的高校校长，并任上海市中文专业教授评审组组长，兼艺术专业教授评审组组长。

曾获“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上海十大高教精英”，“中国最值得尊敬的文化人物”等荣誉称号。

二十多年前毅然辞去一切行政职务和高位任命，孤身一人考察并阐释中华文明诸多被埋没的重要遗址。

这些遗址由此受到保护和弘扬，他也被公认为当代中国重新梳理传统文化的主要代表人物。

所写作品，开创了“文化大散文”的一代文风，追慕者众多。

二十世纪末，又冒着生命危险贴地穿越数万公里考察人类最重要的文明故地，对当代世界文明作出了一系列全新思考和紧迫提醒。

作为国际间唯一亲身完成这种穿越的人文教授，及时判断了新一轮恐怖主义的发生地，准确预言了欧洲不同国家的经济危局，在海内外引起极大关注。

在这过程中所写的书籍，长期位居全球华文书排行榜前列。

仅在台湾一地，就囊括了白金作家奖、桂冠文学家奖、读书人最佳书奖、金石堂最有影响力书奖等一系列重大奖项。

以高层级的思考性作品，持续二十年创造了惊人的畅销奇迹。

直至二〇一一年一月，国内发行量最大的《扬子晚报》和江苏教育出版社在全国各省青年学生中票选“谁是您最喜爱的当代作家”，仍名列第一，且遥遥领先。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北京大学、《中华英才》杂志等机构一再为他颁奖，表彰他“把深入研究、亲临考察、有效传播三方面合于一体”，是“文采、学问、哲思、演讲皆臻高位的当代巨匠”。

自二〇〇二年起，赴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大学、华盛顿国会图书馆讲授“中华宏观文化史”、“中外文化对比史”等课题，广受好评。

二〇〇八年，上海市教育委员会颁授成立“余秋雨大师工作室”。

最近几年，兼任香港浸会大学人文奠基教授、香港凤凰卫视首席文化顾问、澳门科技大学人文艺术学院院长。

<<中国文脉>>

书籍目录

中国文脉
笔墨历史
猜测黄帝
感悟神话
发现殷墟
老子和孔子
黑色光亮
稷下学宫
第一诗人
《离骚》今译
历史母本
那一家
魏晋绝响
田园何处
走向大唐
佛教的事
仰望长安
唐诗几男子
乱麻蕴藏
陌生人
断裂
六百年郁闷
十万进士

<<中国文脉>>

章节摘录

中国文脉—中国文脉，是指中国文学几千年发展中最高等级的生命潜流和审美潜流。这种潜流，在近处很难发现，只有从远处看去，才能领略大概，就像那一条倔犟的山脊所连成的天际线。

正是这条天际线，使我们知道那个天地之大，以及那个天地之限，并领略了一种注定要长久包围我们生命文化仪式。

因为太重要，又处于隐潜状态，就特别容易产生误会。

因此，我们必须开宗明义，指出那些最常见的理论岔道，不让它们来干扰文脉的潜流——一、这股潜流，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不是官方主流；二、这股潜流，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不是民间主流；三、这股潜流，属于文学，并不从属于哲学学派；四、这股潜流，虽然重要，但体量不大；五、这股潜流，并不一以贯之，而是时断时续，断多续少；六、这股潜流，对周围的其他文学现象有吸附力，更有排斥力。

寻得这股潜流，是做减法的结果。

我一向主张，研究文化和文学，先做加法，后做减法。

减法更为重要，也更为艰难。

减而见筋，减而显神，减而得脉。

减法难做，首先是因为人们千百年来一直处于文化匮乏状态，见字而敬，见文而信，见书而畏，不存在敢于大胆取舍的心理高度；其次，即使有了心理高度，也缺少品鉴高度，与多数轰传一时的文化现象相比，“得脉”者没有那么多知音。

大胆取舍，需要锐利斧钺。

但是，手握这种斧钺的人，总是在开山辟路。

那些只会坐在凉棚下说三道四、指手画脚的人，大多不懂斧钺。

开山辟路的人没有时间参与评论，由此造成了等级的倒错、文脉的失落。

等级，是文脉的生命。

人世间，仕途的等级由官阶来定，财富的等级由金额来定，医生的等级由疗效来定，明星的等级由传播来定，而文学的等级则完全不同。

文学的等级，与官阶、财富、疗效、传播等因素完全无关，只由一种没有明显标志的东西来定，这个东西叫品位。

其他行业也讲品位，但那只是附加，而不像文学，是唯一。

总之，品位决定等级，等级构成文脉。

但是，这中间的所有流程，都没有清晰路标。

这一来，事情就麻烦了。

环顾四周，现在越来越多的“成功者”都想以文炫己，甚至以文训世，结果让人担忧。

有些“儒商”为了营造“企业文化”，强制职工背诵古代那些文化等级很低的发蒙文言；有些电视人永远在绘声绘色地讲述着早就应该退出公共记忆的文化残屑；有些当代“名士”更是染上了古代的“嗜痂之癖”，如鲁迅所言，把远年的红肿溃烂，赞之为“艳若桃花”。

颇让人不安的，是目前电视上某些文物鉴定和拍卖节目，只要牵涉到明清和近代书画，就对作者的文化地位无限拔高。

初一听，溢美古人，无可厚非，但是这种事情不断重复也就颠覆了文化的基本等级。

就像一座十层高塔，本来轮廓清晰，突然底下几层要自成天台，那么上面的几层只能坍塌。

试想，如果唐伯虎、乾隆都成了“中国古代一流诗人”，那么，我们只能悄悄把整部《全唐诗》付之一炬了。

书法也是一样，一个惊人的天价投向一份中等水准的笔墨，就像一堆黄金把中国书法史的天平压垮了。

面对这种情况我曾深深一叹：“文脉既隐，小丘称峰；健翅已远，残羽充鹏。

”照理，文物专家不懂文脉，亿万富翁不懂文化，十分正常。

<<中国文脉>>

但现在，现代传媒的渗透力度，拍卖资金的强烈误导，使很多人难以抗拒地接受了这种空前的“文化改写”，结果实在有点恐怖。

有人说，对文学，应让人们自由取用，不要划分高低。

这是典型的“文学民粹主义”，似是而非。

就个人而言，不经过基本教育，何能自由取用？

鼠目寸光、井蛙观天，恰恰违背了“自由”的本义；就整体而言，如果在精神文化上也不分高低，那就会失去民族的大道、人类的尊严，一切都将在众声喧哗中不可收拾。

如果不分高低，只让每个时间和空间的民众自由取用、集体“海选”，那么，中国文学，能选得到那位流浪草泽、即将投水的屈原吗？

能选得到那位受过酷刑、耻而握笔的司马迁吗？

能选得到那位僻居荒村、艰苦躬耕的陶渊明吗？

他们后来为民众知道，并非民众自己的行为。

而且，知道了，也并不能体会他们的内涵。

因此我敢断言，任何民粹主义的自由海选，即便再有人数、再有资金，也与优秀文学基本无关。

这不是文学的悲哀，而是文学的高贵。

我主张，在目前必然寂寞的文化良知领域，应该重启文脉之思，重开严选之风，重立古今坐标，重建普世范本。

为此，应努力拨去浮华热闹，远离滔滔口水，进入深度探讨。

选择自可不同，目标却是同归，那就是清理地基，搬开芜杂，集得高墙巨砖，寻获大柱石础，让出疏朗空间，洗净众人耳目，呼唤亘古伟步，期待天才再临。

由此，中华文化的复兴，才有可能。

二文脉的原始材料，是文字。

汉字大约起源于五千多年前。

较系统的运用，大约在四千年前。

不断出现的考古成果既证明着这个年份，又质疑着这个年份。

据我比较保守的估计，大差不差吧，除非有了新的惊人发现。

汉字产生之后，经由“象形——表意——形声”这几个阶段，开始用最简单的方法记载历史，例如王朝谱牒。

应该夏朝就有了，到商代的甲骨文和金文，已相当成熟。

但是，甲骨文和金文的文句，还构不成文学意义上的“文脉之始”。

文学，必须由“意指”走向“意味”。

这与现代西方美学家所说的“有意味的形式”，有点关系。

既是“意味”又是“形式”，才能构成完整的审美。

这种完整，只有后来的《诗经》，才能充分满足。

《诗经》产生的时间，大概离现在二千六百年到三千年左右。

然而，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

商代的甲骨文和金文虽然在文句上还没有构成“文脉之始”，但在书法上却已构成了。

如果我们把“文脉”扩大到书法，那么，它就以“形式领先”的方式开始于商代，比《诗经》早，却又有所交错。

正因为此，我很喜欢去河南安阳，长久地看着甲骨文和青铜器发呆。

甲骨文多半被读解了，但我总觉得那里还埋藏着孕育中国文脉的神秘因子。

一个横贯几千年的文化行程将要在哪里启航，而直到今天，那个老码头还是平静得寂然无声。

终于听到声音了，那是《诗经》。

《诗经》使中国文学从一开始就充满了稻麦香和虫鸟声。

这种香气和声音，将散布久远，至今还闻到、听到。

十余年前在巴格达的巴比伦遗址，我读到了从楔形文字破译的古代诗歌。

那些诗歌是悲哀的，慌张的，绝望的，好像强敌刚刚离去，很快就会回来。

<<中国文脉>>

因此，歌唱者只能抬头盼望神祇，苦苦哀求。

这种神情，与那片土地有关。

血腥的侵略一次次横扫，人们除了奔逃还是奔逃，因此诗句中有一些生命边缘的吟咏，弥足珍贵。但是，那些吟咏过于匆忙和粗糙，尚未进入成熟的文学形态，又因为楔形文字的很早中断，没有构成下传之脉。

同样古老的埃及文明，至今没见过古代留下的诗歌和其他文学样式。

卢克索太阳神庙大柱上的象形文字，已有部分破译，却并无文学意义。

过于封闭、过于保守的一个个王朝，曾经留下了帝脉，而不是文脉。

即便有气脉，也不是诗脉。

印度在古代是有灿烂的文学、诗歌、梵剧、理论，但大多是围绕着“大梵天”的超验世界。

同样是农耕文明，却缺少土地的气息和世俗的表情。

《诗经》的吟唱者们当然不知道有这种对比，但我们一对比，它也就找到了自己。

其实，它找到的，也是后代的中国。

《诗经》中，有祭祀，有抱怨，有牢骚，但最主要、最拿手的，是在世俗生活中抒情。

其中抒得最出色的，是爱情。

这种爱情那么“无邪”，既大胆又羞怯，既温柔又敦厚，足以陶冶风尚。

在艺术上，那些充满力度又不失典雅的四字句，一句句排下来，成了中国文学起跑点的砖砌路基。

那些叠章反复，让人立即想到，这不仅仅是文学，还是音乐，还是舞蹈。

一切动作感涨满其间，却又毫不鲁莽，优雅地引发乡间村乐，咏之于江边白露，舞之于月下乔木。

终于由时间定格，凝为经典。

没有巴比伦的残忍，没有卢克索的神威，没有恒河畔的玄幻。

《诗经》展示了黄河流域的平和、安详、寻常、世俗，以及有节制的谴责和愉悦。

但是，写到这里必须赶快说明，在《诗经》的这种平实风格后面，又有着一系列宏大的传说背景。

传说分两种：第一种是“祖王传说”，有关黄帝、炎帝和蚩尤；第二种是“神话传说”，有关补天、填海、追日、奔月。

按照文化人类学的观念，传说和神话虽然虚无缥缈，却对一个民族非常重要，甚至可以成为一种历久不衰的“文化基因”。

这在中华民族身上尤其明显，谁都知道，有关黄帝、炎帝、蚩尤的传说，决定了我们的身份；有关补天、填海、追日、奔月的传说，则决定了我们的气质。

这两种传说，就文化而言，更重要的是后一种神话传说，因为它们为一个庞大的人种提供了鸿蒙的诗意。

即便是离得最近的《诗经》，也在平实的麦香气中熔铸着伟大和奇丽。

于是，我们看到了，背靠着一大批神话传说，刻写着一行行甲骨文、金文，吟唱着一首首《诗经》，中国文化隆重上路。

其实，这也就是以孔子、老子为代表的先秦诸子出场前的精神背景。

先秦诸子出场，与世界上其他文明的巨人们一起组成了一个“轴心时代”，标志着人类智能的大爆发。

现代研究者们着眼最多的，是各地巨人们在当时的不同思想成果，却很少关注他们身上带着什么样的文化基因。

三先秦诸子，都是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没有一个是纯粹的文学家。

但是，他们要让自己的思想说服人、感染人，就不能不运用文学手段。

而且，有一些思维方式，从产生到完成都必须仰赖自然、譬引鸟兽、倾注情感、形成寓言，这也就成了文学形态。

思想家和哲学家在运用文学手段的时候，有人永远把它当做手段，有人则不小心暴露了自己其实也算得上是一个文学家。

先秦诸子由于社会影响巨大，历史贡献卓著，因此对中国文脉的形成有特殊贡献。

但是，这种贡献与他们在思想和哲学上的贡献，并不一致。

<<中国文脉>>

我对先秦诸子的文学品相分为三个等级——第一等级：庄子、孟子；第二等级：老子、孔子；第三等级：韩非子、墨子。

在这三个等级中，处于第一等级的庄子和孟子已经是文学家，而庄子则是一位大文学家。

把老子和孔子放在第二等级，实在有点委屈这两位精神巨匠了。

我想他们本人都无心于自身的文学建树，但是，虽无心却有大建树。

这便是天才，这便是伟大。

在文脉上，老子和孔子谁应领先？

这个排列有点难。

相比之下，孔子的声音，是恂恂教言，浑厚恳切，有人间炊烟气，令听者感动，令读者萦怀；相比之下，老子的声音，是铿锵断语，刀切斧劈，又如上天颁下律令，使听者惊悚，使读者铭记。

孔子开创了论语式的散文体裁，使散文成为一种有可能承载厚重责任、端庄思维的文体。

孔子的厚重和端庄并不堵眼堵心，而是仍然保持着一种健康君子的斯文潇洒。

更重要的是，由于他的思想后来成了千年正统，因此他的文风也就成了永久的楷模。

他的文风给予中国历史的，是一种朴实的正气，这就直接成了中国文脉的一种基调。

中国文脉，蜿蜒曲折，支流繁多，但是那种朴实的正气却颠扑不灭。

因此，孔子于文，功劳赫赫。

本来，孔子有太多的理由在文学上站在老子面前，谁知老子另辟奇境，别创独例。

以极少之语，蕴极深之义，使每个汉字重似千钧，不容外借。

在老子面前，语言已成为无可辩驳的天道，甚至无须任何解释、过渡、调和、沟通。

这让中国语文，进入了一个几乎空前绝后的圣哲高台。

我听不止一位西方哲学家说：“仅从语言方式，老子就是最高哲学。”

孔子不如老子果断，因此在外人看来，更像一个教育家、社会评论家。

“外国人即使不懂中文，也能从译文感知“最高哲学”的所在，可见老子的表达有一种“骨子里”的高度。

有一段时间，德国人曾骄傲地说：“全世界的哲学都是用德文写的。”

这当然是故意的自我夸耀，但平心而论，回顾以前几百年，德国人也确实有说这种“大话”的底气。

然而，当他们读到老子就开始不说这种话了。

据统计，现在几乎每个德国家庭都有一本老子的书，其普及度远远超过老子的家乡中国。

我一直主张，一切中国文化的继承者，都应该虔诚背诵老子那些斩钉截铁的语言，而不要在后世那些层级不高的文言文上厮磨太久。

说完第二等级，我顺便说一下第三等级。

韩非子和墨子，都不在乎文学，有时甚至明确排斥。

但是，他们的论述也具有了文学素质，主要是那些干净而雄辩的逻辑所造成的简洁明快，让人产生了一种阅读上的愉悦。

当然，他们两人实干家的形象，也会帮助我们产生文字之外的动人想象。

更重要的是要让出时间来看看第一等级，庄子和孟子。

孟子是孔子的继承者，比孔子晚了一百八十年。

在人生格调上，他与孔子很不一样，显得有点骄傲自恃，甚至盛气凌人。

这在人际关系上好像是缺点，但在文学上就不一样了。

他的文辞，大气磅礴，浪卷潮涌，畅然无遮，情感浓烈，具有难以阻挡的感染力。

他让中国语文，摆脱了左顾右盼的过度礼让，连接成一种马奔车驰的畅朗通道。

文脉到他，气血健旺，精神抖擞，注入了一种“大丈夫”的生命格调。

但是，与他同一时期，一个几乎与他同年的庄子出现了。

庄子从社会底层审察万物，把什么都看穿了，既看穿了礼法制度，也看穿了试图改革的宏谋远虑，因此对孟子这样的浩荡语气也投之以怀疑。

岂止对孟子，他对人生都很怀疑。

<<中国文脉>>

真假的区分在何处？

生死的界线在哪里？

他陷入了困惑，又继之以嘲讽。

这就使他从礼义辩论中撤退，回到对生存意义的探寻，成了一个由思想家到文学家的大步跃升。

他的人生调子，远远低于孟子，甚至也低于孔子、墨子、荀子或其他别的“子”。

但是这种低，使他有了孩子般的眼光，从世界和人生底部窥探，问出一串串最重要的“傻”问题。

但仅仅是这样，他还未必能成为先秦诸子中的文学冠军。

他最杰出之处，是用极富想象力的寓言，讲述了一个又一个令人难忘的故事，而在这些寓言故事中，都有一系列鲜明的艺术形象。

这一下，他就成了那个思想巨人时代的异类、一个充满哲思的文学家。

《逍遥游》、《秋水》、《人间世》、《德充符》、《齐物论》、《养生主》、《大宗师》……这些篇章，就成了中国哲学史、也是中国文学史的第一流佳作。

此后历史上一切有文学才华的学人，都不会不粘上庄子。

这个现象很奇怪，对于其他“子”，都因为思想观念的差异而有明显的取舍，但庄子却例外。

没有人会不喜欢他讲的那些寓言故事，没有人会不喜欢他与南天北海融为一体的自由精神，没有人会不喜欢他时而巨鸟、时而大鱼、时而飞蝶的想象空间。

在这个意义上，形象大于思维，文学大于哲学，活泼大于庄严。

四我把庄子说成是“先秦诸子中的文学冠军”，但请注意，这只是在“诸子”中的比较。

如果把范围扩大，那么，他在那个时代就不能夺冠了。

因为在南方，出现了一位比他小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那就是屈原。

屈原，是整个先秦时期的文学冠军。

不仅如此，作为中国第一个大诗人，他以《离骚》和其他作品，为中国文脉输入了强健的诗魂。

对于这种输入，连李白、杜甫也顶礼膜拜。

因此，戴在他头上的，已不应该仅仅是先秦的桂冠。

前面说到，中国文脉是从《诗经》开始的，所以对诗已不陌生。

然而，对诗人还深感陌生，何况是这么伟岸的诗人。

《诗经》中也署了一些作者的名字，但那些诗大多是朝野礼仪风俗中的集体创作，那些名字很可能只是采集者、整理者。

从内容看，《诗经》还不具备强烈而孤独的主体性。

按照我给北京大学学生讲述中国文化史时的说法，《诗经》是“平原小合唱”，《离骚》是“悬崖独吟曲”。

这个悬崖独吟者，出身贵族，但在文化姿态上，比庄子还要“傻”。

诸子百家都在大声地宣讲各种问题，连庄子也用寓言在启迪世人，屈原却不。

他不回答，不宣讲，也不启迪他人，只是提问，没完没了地提问，而且似乎永远无解。

从宣讲到提问，从解答到无解，这就是诸子与屈原的区别。

说大了，也是学者和诗人的区别、教师和诗人的区别、谋士与诗人的区别。

划出了这么多区别，也就有了诗人。

从此，中国文脉出现了重大变化。

不再合唱，不再聚众，不再宣讲。

在主脉的地位，出现了行吟在江风草泽边那个衣饰奇特的身影，孤傲而天真，凄楚而高贵，离群而悯人。

他不太像执掌文脉的人，但他执掌了；他被官场放逐，却被文学请回；他似乎无处可去，却终于无处不在。

屈原自己没有想到，他给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开了一个大玩笑。

玩笑的项目有这样两个方面——一、大家都习惯于称他“爱国诗人”，但他明明把“离”国作为他的主题。

他曾经为楚抗秦，但正是这个秦国，在他身后统一了中国，成了后世“爱国主义”概念中真正的“国

<<中国文脉>>

”。

二、他写的楚辞，艰深而华赡，民众几乎都不能读懂，但他却具备了最高的普及性，每年端午节出现的全民欢庆，不分秦楚，不分雅俗。

这两大玩笑也可以说是两大误会，却对文脉意义重大。

第一个误会说明，中国官场的政治权脉试图拉拢文脉，为自己加持；第二个误会说明，世俗的神祇崇拜也试图借文脉，来自我提升。

总之，到了屈原，文脉已经健壮，被“政脉”和“世脉”深深觊觎，并频频拉扯。

说“绑架”太重，就说“强邀”吧。

雅静的文脉，从此经常会被“政脉”、“世脉”频频强邀，衍生出一个个庞大的政治仪式和世俗仪式。

这种“静脉曲张”，对文脉而言有利有弊，弊大利小；但在屈原身上发生的事，对文脉尚无大害，因为再扩大、再热闹，屈原的作品并无损伤。

在围绕着他的繁多“政脉”、“世脉”中间，文脉仍然能够清晰找到，并保持着主干地位。

记得几年前有台湾大学学生问我，大陆民众在端午节划龙舟、吃粽子的游戏，是否肢解了屈原？

我回答：没有。

屈原本人就重视民俗巫风中的祭祀仪式，后来，民众也把他当做了祭祀对象。

屈原已经不仅仅是你们书房里的那个屈原。

但是如果你们要找书房里的屈原也不难，《离骚》、《九章》、《九歌》、《招魂》、《天问》自可细细去读。

一动一静，一祭一读，都是屈原。

如此文脉，出入于文字内外，游弋于山河之间，已经很成气象。

五屈原不想看到的事情终于发生了，秦国纵横宇内，终于完成了统一大业。

几乎所有的文学史都在谴责秦始皇为了极权统治而“焚书坑儒”的暴行，严重斫伤了中国文化。

繁忙烟尘中的秦朝，所留文迹也不多，除了《吕氏春秋》，就是那位游士政治家李斯了。

他写的《谏逐客书》不错，而我更佩服的是他书写的那些石刻。

字并不多，但一想起就如直面泰山。

对秦始皇的谴责是应该的，但我从更宏观的视角来看，却有另一番见解。

我认为，秦始皇有意做了两件对不起文化的事，却又无意做了两件对得起文化的事，而且那是真正的大事。

他统一中国，当然不是为了文学，却为文学灌注了一种天下一统的宏伟气概。

此后中国文学，不管什么题材，都或多或少地有所隐含。

李白写道：“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

可见这种气概在几百年后仍把诗人们笼罩。

王昌龄写道：“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

秦人为后人开拓了情怀。

不仅如此，秦始皇还统一了文字，使中国文脉可以顺畅地流泻于九州大地。

这种顺畅，尤其是在极大空间中的顺畅，反过来又增添了对于三山五岳、五湖四海的视野和责任。

这就使工具意义和精神意义，产生了相辅相成的互哺关系。

我在世界上各个古文明的废墟间考察时，总会一次次想到秦始皇。

因为那些文明的割裂、分散、小化，都与文字语言的不统一有关。

如果当年秦始皇不及时以强权统一文字，那么，中国文脉早就流逸不存了。

由于秦始皇既统一了中国又统一了文字，此后两千多年，只要是中国文人，不管生长在如何偏僻的角落，一旦为文便是天下兴亡、炎黄子孙；而且，不管面对着多么繁密的方言壁障，一旦落笔皆是汉字汉文，千里相通。

总之，统一中国和统一文字，为中国文脉提供了不可比拟的空间力量和技术力量。

秦代匆匆，无心文事，却为中华文明的格局进行了重大奠基。

<<中国文脉>>

六很快就到汉代了。

历来对中国文脉有一种最表面、最通俗的文体概括，叫做：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

在这个概括中，最弱的是汉赋，原因是缺少第一流的人物和作品。

是枚乘？

是司马相如？

还是早一点的贾谊？

是《七发》、《子虚》、《上林》？

这无论如何有点拿不出手，因为前前后后一看，远远站着的，是屈原、李白、杜甫、苏东坡、关汉卿、曹雪芹啊。

就我本人而言，对汉赋，整体上不喜欢。

不喜欢它的铺张，不喜欢它的富丽，不喜欢它的雕琢，不喜欢它的堆砌，不喜欢它的奇僻，当然，更不喜欢它的歌颂阿谀、不见风骨。

我的不喜欢，还有一个长久的心结，那就是从汉代以后二千年间，中国社会时时泛起的奉承文学，都以它为范本。

汉赋的产生是有原因的。

一个强大而富裕的王朝建立起来了，确实处处让人惊叹，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文化统治使很多文人渐渐都成了“润色鸿业”的驯臣。

再加上汉武帝自己的爱好，那些辞赋也就成了朝廷的主流文本，可称为“盛世宏文”。

几重因素加在一起，那么，汉赋也就志满意得、恣肆挥洒。

文句间那层层渲染的排比、对偶、连词，就怎么也挡不住了。

这是文学史上的一种奇观，如此抑扬顿挫、涌金叠银、流光溢彩，确实也使汉语增添了不少词藻功能和节奏功能。

说实话，我在研究汉代艺术史的时候曾从不少赋作中感受过当时当地的气象，颇有收获；但从文学的角度来看，这些赋，毕竟那么缺少思想、缺少个性、缺少真切、缺少诚恳，实在很难在中国文脉中占据太多正面地位。

这就像我们见过的有些名流，在重要时段置身重要职位，服饰考究，器宇轩昂，但一看内涵，却是空泛呆滞、言不由衷，那就怎么也不会真正入心入情，留于记忆。

这，也正是我在做过文学史、艺术史的各种系统阐述之后，特别要跳开来用挑剔的目光来检索文脉的原因。

如果仍然在写文学史，那就不应该表达那么鲜明的取舍褒贬。

汉赋在我心中黯然失色，还有一个尴尬的因素，那就是，离它不远，出现了司马迁的《史记》。

司马迁和《史记》，这是我心中永远的太阳。

大家可能看到，坊间有一本叫《中国文化四十七堂课——从北大到台大》的书，这是我为北京大学中文系、历史系、哲学系、艺术学院的部分学生讲授“中国文化史”的课堂记录，在大陆和台湾都成了畅销书。

四十七堂课，每堂都历时半天，每星期一堂，因此是一整年的课程。

用一年来讲述四千年，无论怎么说还是太匆忙，结果，即使对于长达五百年的明、清两代，我也只用了两堂课来讲述（第四十四、四十五堂课）。

然而，我却为一个人讲了四堂课（第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堂课）。

这个人就是司马迁。

看似荒唐的比例，表现出我心中的特殊重量。

司马迁在历史学上的至高地位，我们在这里暂且不说，只说他的文学贡献。

是他第一次，通过对一个个重要人物的生动刻画，写出了中国历史的魂魄。

因此也可以说，他将中国历史拟人化、生命化了。

更惊人的是，他在汉赋的包围中，居然不用整齐的形容、排比、对仗，更不用词藻的铺陈，而只以从容真切的朴素笔触、错落有致的自然文句，做到了这一切。

<<中国文脉>>

于是，他也就告诉人们：能把千钧历史撬动起来浸润到万民心中的，只有最本色的文学力量。

大家说，他借用文学写好了历史；我则说，他借用历史印证了文学。

除了虚构之外，其他文学要素他都酣畅地运用到了极致。

但他又不露痕迹，高明得好像没有运用。

不要说他同时的汉赋，即使是此后两千年的文学一旦陷入奢靡，不必训斥，只须一提司马迁，大多就会从梦魇中惊醒，吓出一身冷汗。

除非，那些人没读过司马迁，或读不懂司马迁。

我曾一再论述，就散文而言，司马迁是中国古代第一支笔。

他超过“唐宋八大家”，更不要说其他什么派了。

“唐宋八大家”中，也有几个不错，但与司马迁一比，格局小了，又有点“做”。

这放到后面再说吧。

七不要快速地跳到唐代去。

由汉至唐，世情纷乱，而文脉健旺。

我对于魏晋文脉的梳理，大致分为“三段论”——首先，不管大家是否乐见，第一个在战火硝烟中接续文脉的，是曹操。

我曾在《丛林边的那一家》中写道：“曹操一心想做军事巨人和政治巨人而十分辛苦，却不太辛苦地成了文化巨人。

”我还拿同时代写了感人散文《出师表》的诸葛亮和曹操相比，结论是：“任何一部《中国文学史》，遗漏了曹操都是难于想象的，而加入了诸葛亮也是难于想象的。

”曹操的军事权谋形象在中国民间早就凝固，却缺少他在文学中的身份。

然而，当大家知道，那些早已成为中国熟语的诗句居然都出自他的手笔，常常会大吃一惊。

哪些熟语？

例如：“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月明星稀，乌鹊南飞”；“山不厌高，海不厌深”；“东临碣石，以观沧海”；“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还有那些描写乱世景象的著名诗句：“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在漫长的历史上，还有哪几个文学家，能让自己的文句变成千年通用？

可能举得出三四个，不多，而且渗入程度似乎也不如他广泛。

更重要的是等级。

我在对比后曾说，诸葛亮的文句所写，是君臣之情；曹操的文句所写，是宇宙人生。

不必说诸葛亮，即便在文学史上，能用那么开阔的气势来写宇宙人生的，还有几个？

而且从我特别看重的文学本体来说，像他那么干净、朴素、凝炼的笔墨，又有几个？

曹操还有两个真正称得上文学家的儿子，曹丕、曹植。

父子三人中，文学地位最低而终于做了皇帝的曹丕，就文笔论，在数千年中国帝王中也能排到第二。

第一是李煜，以后的事了。

在三国时代，哪一个军阀都少不了血腥谋略。

中国文人历来对曹操的恶评，主要出于一个基点，那就是他要“断绝刘汉正统”。

但是我们如果从宏观文化上看，在兵荒马乱的危局中真正把中国文脉强悍地接续下来的，是谁呢？

这是“三段论”的第一段。

第二段，曹操的书记官阮瑀生了一个儿子叫阮籍，接过了文脉。

还算直接，却已有了悬崖峭壁般的“代沟”。

比阮籍小十余岁的嵇康，再加上一些文士，通称为“魏晋名士”。

其实，真正得脉者，只有阮籍、嵇康两人。

这是一个“后英雄时代”的文脉旋涡。

史诗传奇结束，代之以恐怖腐败，文士们由离经之议、忧生之嗟而走向虚无避世。

生命边缘的挣扎和探询，使文化感悟告别正统，向着更危险、更深秘的角落释放。

奇人奇事，奇行奇癖，随处可见。

<<中国文脉>>

中国文化，看似主脉已散，却四方奔溢，气貌繁盛。

当然，繁盛的是气貌，而不是作品。

那时留下的重大作品不多，却为中国文人在血泊和奢侈间的人格自信，提供了众多模式。

阮籍、嵇康是同年死的。

在他们死后两年建立了西晋王朝，然后内忧外患，又是东晋，又是南北朝，说起来很费事。

只是远远看去，阮籍、嵇康的风骨是找不到了，在士族门阀的社会结构中，文人们玄风颇盛。

玄谈，向被诟病。

其实中国文学历来虽有写意、传神等风尚，却一直缺少形而上的超验感悟、终极冥思。

倘若借助于哲学，中国哲学也过于实在。

而且在汉代，道家、儒家又被轮番征用为朝廷主流教化，那就不能指望了。

因此，我们的这些玄谈文士们能把哲学拉到自己身上，尤其出入佛道之间，每个人都弄得像是从空而降的思想家似的，我总觉得利多于弊。

胡辩瞎谈的当然也有不少，但毕竟有几个是在玄思之中找到了自己，获得了个体文化的自立。

其中最好的例子要算东晋的王羲之了。

他写的《兰亭序》，大家只看他的书法，其实内容也可一读，是玄谈中比较干净、清新的一种。

我在为北大学生讲课时特地把它译述了一遍，让年轻人知道当时这些人在想什么。

学生们一听，都很喜欢。

王羲之写《兰亭序》是在公元三五三年，地点在浙江绍兴，那年他正好五十岁。

在写完《兰亭序》十二年之后，江西九江有一个孩子出生，他将开启魏晋南北朝文学“三段论”的第三段。

这就是第三段的主角，陶渊明。

就文脉而言，陶渊明又是一座时代最高峰了。

自秦汉至魏晋，时代最高峰有三座：司马迁、曹操、陶渊明。

若要对这三座高峰做排列，那么，司马迁第一，陶渊明第二，曹操第三。

曹操可能会气不过，但只能让他息怒了。

理由有三：一、如果说，曹操们着迷功业，名士们着迷自己，而陶渊明则着迷自然。

最高是谁，一目了然。

在陶渊明看来，不要说曹操，连名士们也把自己折腾得太过分了。

二、陶渊明以自己的诗句展示了鲜明的文学主张，那就是戒色彩，戒夸饰，戒繁复，戒深奥，戒典故，戒精巧，戒黏滞。

几乎，把他前前后后一切看上去“最文学”的架势全推翻了，呈现出一种完整的审美系统。

态度非常平静，效果非常强烈。

三、陶渊明创造了一种以“田园”为标帜的人生境界，成了一种千年不移的文化理想。

不仅如此，他还在这种“此岸理想”之外提供了一个“彼岸理想”——桃花源，在中华文化圈内可能无人不知。

把一个如此缥缈的理想闹到无人不知，谁能及得？

就凭这三点，曹操在文学上只能老老实实地让陶渊明几步了，让给这位不识刀戟、不知谋术、在陋屋被火烧后不知所措的穷苦男人。

陶渊明为中国文脉增添前所未有的自然之气、洁净之气、淡远之气。

而且，又让中国文脉跳开了非凡人物，而从凡人身上穿过，变得更普世了。

讲了陶渊明，也省得我再去笑骂那个时代很嚣张的骈体文了。

那是东汉时期开始的汉赋末流，滋生蓬勃于魏晋，以工整、华丽的“假大空”为其基本特征。

而且也像一切末流文学，总是洋洋得意，而且朝野吹捧。

只要是“假大空”，朝野不会不喜欢。

八眼前就是南北朝了。

那就请允许我宕开笔去，说一段闲话。

上次去台湾，文友蒋勋特意从宜兰山居中赶到台北看我，有一次长谈。

<<中国文脉>>

有趣的是，他刚出了一本谈南朝的书，而我则花几年时间一直在流连北朝，因此虽然没有预约，却一南一北地畅谈起来了。

台湾《联合报》记者得知我们两人见面，就来报道，结果出了一大版有关南北朝的文章，在今天的闹市中显得非常奇特。

蒋兄写南朝的书我还没有看，但由他来写，一定写得很好。

南朝比较富裕，又重视文化，文人也还自由，可谈的话题当然很多。

蒋兄写了，我就不多啰唆了，还是抬头朝北，说北朝吧。

蒋兄沉迷南朝，我沉迷北朝，这与我们不同的气质有关，虽老友也“和而不同”。

我经过初步考证，怀疑自己的身世可能是古羌而入西夏，与古代凉州脱不了干系，因此本能地亲近北朝。

北朝文化，至少有一半来自凉州。

当然，我沉迷北朝，还有更宏观的原因，而且与现在正在梳理的宏观文脉相关。

文脉一路下来，变化那么大，但基本上在一个近似的文明之内转悠。

或者说，就在黄河和长江这两条河之间轮换。

例如：《诗经》和诸子是黄河流域，屈原是长江流域；司马迁是黄河流域，陶渊明是长江流域。

这么一个格局，在幅员广阔的中国也不见得局促。

但是那么多年过去，人们不禁要问，作为一种大文化，能不能把生命场地放得再开一些？

于是，公元五世纪，大机缘来了。

由鲜卑族建立的北魏王朝，由于文明背景的重大差异，本该对汉文化带来沉重劫难，就像公元四七六年欧洲的西罗马帝国被“北方蛮族”灭亡，古希腊、古罗马文明一时陷入黑暗深渊一般；谁料想，北魏的鲜卑族统治者中有一些杰出人物，尤其是孝文帝拓跋宏（元宏），居然虔诚地拜汉文化为师，快速提升统治集团的文明等级，情况就发生了惊人的变化。

他们既然善待汉文化，随之也就善待佛教文化，以及佛教文化背后的印度文化。

这一来，已经在犍陀罗等地相依相融的希腊文化、波斯文化，乃至巴比伦文化也一起卷入，中国北方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世界文明大会聚。

从此，中国文化不再只是流转于黄河、长江之间了。

经由从大兴安岭出发的浩荡胡风，茫茫北漠，千里西域，都被裹卷，连恒河、印度河、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的波涛也隐约可见，显然，它因包容而更加强盛。

山西大同的云冈石窟可以作为这种文明大会聚的最好见证，因此我在那里题了一方石碑，上刻八字：

“中国由此迈向大唐。

”这就是说，在差不多同时，当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的文脉被“北方蛮族”突然阻断，而且会阻断近千年的当口上，中国文脉，却突然被“北方蛮族”大幅提振，并注定要为全人类的文明进程开辟一个值得永远仰望的“制高点”。

阿基米德说：“给我一个支点，我能撬起整个地球。

”我觉得，北魏就是一个历史支点，它撬起了唐朝。

当然，我所说的唐朝，是文化的唐朝。

为此，我长久地心仪北魏，寄情北魏。

即使不从“历史支点”的重大贡献着眼，当时北方的文化，也值得好好观赏。

它们为中华文化提供了一种力度、一种陌生，让人惊喜。

例如，那首民歌：“敕勒川，阴山下。

天似穹庐，笼盖四野。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这里出现了中国文学中未曾见过的辽阔和平静，平静得让人不好意思再发什么感叹。

但是，它显然闯入了中国文学的话语结构，不再离开。

当然，直接撼动文脉的是那首北朝民歌《木兰诗》。

“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这么轻快、愉悦的语言节奏，以及前面站着的这位健康、可爱的女英雄，带着北方大漠明丽的蓝天，带着战火离乱中的伦理情感，大踏步走进了中国文学的主体部位。

<<中国文脉>>

你看，直到当代，国际电影界要找中国题材，首先找到的也还是花木兰。

在文人圈子里，南朝文人才思翩翩，有一些理论作品为北方所不及，如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

而且，他们还在忙着定音律、编文选、写宫体。

相比之下，北朝文人没那么多才思。

但是，他们拿出来的作品却别有一番重量，例如我本人特别喜爱的酈道元的《水经注》和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

这些作品的纪实性、学术性，使一代散文走向厚实，也使一代学术亲近散文。

酈道元和杨衒之，都是河北人。

九唐代是一场审美大爆发，简直出乎所有文人的意料。

文人对前景的预料，大多只从自己和文友的状况出发。

即便是南朝的那些专门研究来龙去脉的理论家、文选家，也无法想象唐代的来到。

人们习惯于从政治上的盛世，来看待文化上的繁荣，其实这又在以“政脉”解释“文脉”。

政文两途，偶尔交错。

然而，虽交错也未必同荣共衰。

唐代倒是特例，原先酝酿于北方旷野上、南方巷陌间的文化灵魂已经积聚有时，其他文明的渗透、发酵也到了一定地步，等到政局渐定，民生安好，西域通畅，百方来朝，政治为文化的繁荣提供了极好的平台，因此出现了一场壮丽的大爆发。

这是机缘巧合、天佑中华，而不是由政治带动文化的必然规律。

其实，这种“政文俱旺”的现象，在历史上也仅此一次。

不管怎么说，有没有唐代的这次大爆发，对中国文化大不一样。

试看天下万象：一切准备，如果没有展现，那就等于没有准备；一切贮存，如果没有启用，那就等于没有贮存；一切内涵，如果没有表达，那就等于没有内涵；一切灿烂，如果没有迸发，那就没有灿烂；一切壮丽，如果没有会聚，那就没有壮丽。

更重要的是，所有的展现、迸发、会聚，都因群体效应产生了新质，与各自原先的形态已经完全不同。

因此，大唐既是中国文化的平台，又是中国文化的熔炉。

既是一种集合，又是一种冶炼。

唐代还有一个好处，它的文化太强了，因此成了中国历史上唯一不以政治取代文化的朝代。说唐朝，就很难以宫廷争斗掩盖李白、杜甫。

而李白、杜甫，也很难被曲解成政治人物，就像屈原所蒙受的那样。

即使是真正的政治人物如颜真卿，主导了一系列响亮的政治行动，但人们对他的认知，仍然是书法家。

鲁迅说，魏晋时代是文学自觉的时代。

这大致说得不错，只是有点夸张，因为没有“自立”的“自觉”，很难长久成立。

唐代，就是一个文学自立的时代，并因自立而自觉。

文学的自立，不仅是对于政治，还对于哲学。

现代有研究者说，唐代缺少像样的哲学家和思想家。

这种说法也大致不错，但不必抱怨。

作为一种强大而壮丽的审美大爆发，不能不让哲学的油灯黯淡了。

文学不必贯穿一种稳定而明确的哲学理念。

文学就是文学，只从人格出发，不从理念出发；只以形式为终点，不以教化为目的。

请问唐代那些大诗人各自信奉什么学说？

实在很难说得清楚，而且一生多有转换，甚至同时几种交糅。

但是，这一点儿也不影响他们写出千古佳作。

为什么一个时代不能由文学走向深刻呢？

为什么一批文学家不能以美为目标，而必须以理念为目标？

<<中国文脉>>

唐代文学，说起来太冗长。

我多年前在为北大学生讲授中国文化史时曾鼓励他们用投票的方式为唐代诗人排一个次序。

标准有两个：一是诗人们真正抵达的文学高度；二是诗人们在后世被民众喜爱的广度。

北大学生投票的结果是这样十名——第一名：李白；第二名：杜甫；第三名：王维；第四名：白居易；第五名：李商隐；第六名：杜牧；第七名：王之涣；第八名：刘禹锡；第九名：王昌龄；第十名：孟浩然。

有意思的是，投票的那么多学生，居然没有两个人的排序完全一样。

这个排序，可能与我自己心中的排序还有一些出入。

但高兴的是，大家没有多大犹豫，就投出了前四名：李白、杜甫、王维、白居易。

这前四名，合我心意。

在一个琳琅满目的世界，学会排序是一种本事，不至于迷路。

有的诗文，初读也很好，但通过排序比较，就会感知上下之别。

日积月累，也就有可能深入文学最微妙的堂奥。

例如，很多人都会以最高的评价来推崇初唐诗人王勃所写的《滕王阁序》，把其中“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说成是“全唐第一佳对”，这就是没有排序的结果。

一排，发现这样的骈体文在唐代文学中的地位不应该太高。

可理解的是，王勃比李白、王维大了整整半个世纪，与唐代文学的黄金时代相比，是一种“隔代”存在。

又如，人们也常常对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赞之有过，连闻一多先生也曾说它是“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

但我坚持认为，当李白、杜甫他们还远远没有出生的时候，唐诗的“顶峰”根本谈不上，更不要说“顶峰上的顶峰”了。

但是，无论是王勃还是张若虚，已经表现出让人眼睛一亮的初唐气象。

在他们之后，会有盛唐、中唐、晚唐，每一个时期各不相同，却都天才喷涌、大家不绝。

唐代，把文学的各个最佳可能，都轮番演绎了一遍。

请看，从发轫，到飞扬，到悲哀，到反观，到个人，到凄迷，各种文学意味都以最强烈的方式展现了，几乎没有重大缺漏。

因此，一个杰出时代的文学艺术史，很可能被看成了人类文学艺术史的浓缩版。

有学生问我，如果时间有限，却要集中地感受一下中国文化的极端丰富，又不想跳来跳去，读什么呢？

我回答：“读唐诗吧。”

”与我前面列述的中国文脉的峰峦相比，唐诗具有全民性。

唐诗让中国语文具有了普遍的附着力、诱惑力、渗透力，并让它们笼罩九州、镌刻山河、朗朗上口。

有过了唐诗，中国大地已经不大有耐心来仔细倾听别的诗句了。

因为有了唐诗，倾听者的范围早就超过了文苑、学界，拓展为一个漫无边际的不确定群落。

他们粗糙，但很挑剔。

两句听不进去，他们就转身而去，重新吟诵起李白、杜甫。

十再说一说唐代的文章。

唐代的文章，首推韩愈、柳宗元。

自司马迁之后九百多年，中国散文写得最好的，也就是他们两位了，因此他们并不仅仅归属于唐代，也算是“千年一出”之人。

他们两位，是后世所称“唐宋八大家”的领头者。

我在前面说过，“唐宋八大家”的文学成就，在整体上还比不过司马迁一人，这当然也包括他们两位在内。

但是，他们两位，做了一件力挽狂澜的大事，改变了一代文风，清理了中国文脉，这是司马迁所未曾做过的。

他们再也不能容忍从魏晋以来越来越盛炽的骈体文了。

<<中国文脉>>

自南朝的宋、齐、梁、陈到唐初，这种文风就像是藻荇藤蔓，已经缠得中国文学步履蹒跚。但是，文坛和民众却不知其害，以为光彩夺目、堆锦积绣，就是文学之胜，还在竞相趋附。面对这种风气，韩愈和柳宗元都想重新接通从先秦诸子到屈原、司马迁的气脉，为古人和古文“招魂”。

因此，他们发起了一个“古文运动”。

按照韩愈的说法，汉代以后的文章，他已经不敢看了。

（《答李翱书》：“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

这种主张，初一看似乎是在“向后走”，但懂得维护文脉的人都知道，这是让中国文化有能力继续向前走的基本条件。

他们两人，特别是韩愈，显然遇到了一个矛盾。

他崇尚古文，又讨厌因袭；那么，对古人就能因袭了吗？

他几经深思，得出明确结论：对古文，“师其意而不师其辞”，学习者必须“自树立，不因循”。

甚至，他更透彻地说：“惟陈言之务去”。

只要是套话、老话、讲过的话，必须删除。

因此，他的“古文运动”，其实不是模仿古文，而是寻找千年来未颓的“古意”。

“古意”本身，就包含着创新，包含着不可重复的个性，即“词必己出”。

他与柳宗元在这件事上有一个强项，那就是不停留在空论上，而是拿出了自己的一大批示范作品。

韩愈的散文，气魄很大，从句式到词汇都充满了新鲜活力。

但是相比之下，柳宗元的文章写得更清雅、更诚恳、更隽永。

韩愈在崇尚古文时，也崇尚古文里所包含的“道”，这使他的文章难免有一些说教气。

柳宗元就没有这种毛病，他被贬于柳州、永州时，离文坛很远，只让文章在偏僻而美丽的山水间一笔笔写得更加情感化、寓言化、哲理化，因此也达到了更高的文学等级。

与他一比，韩愈那几篇名文，像《原道》、《原毁》、《师说》、《争臣论》等等，道理盖过了审美，已经模糊了论文和文学的界限。

总之，韩愈、柳宗元他们既有观念，又有实践，“古文运动”展开得颇有声势。

骈体文的地位很快被压下去了，但是，随之也带来了一些消极的后果。

在骈体文盛行的魏晋南北朝，文学已经逐渐自觉，虽触目秾丽，也是文学里边的事。

现在“古文运动”让文章重新载道，迎来了太多观念性因素。

这些因素，与文学不亲。

十一唐朝灭亡后，由藩镇割据而形成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

一度曾经诗情充溢的北方已经很难寻到诗句，而南方却把诗文留存了。

特别是，那个南唐的李后主李煜，本来从政远不及吟咏，当他终于成了俘虏被押解到汴京之后，一些重要的诗句穿过亡国之痛而飘向天际，使他成了一种新的文学形式——“词”的里程碑人物。

李煜又一次充分证明了“政脉”与“文脉”是两件事。

在那个受尽屈辱的俘居小楼，在他时时受到死亡威胁而且确实也很快被毒死的生命余隙之中，明月夜风知道：中国文脉光顾此处。

从此，“春花秋月”、“一江春水”、“不堪回首”、“流水落花”、“天上人间”、“仓皇辞庙”等等意绪，以及承载它们的“长短句”的节奏，将深深嵌入中国文化；而这个倒霉皇帝所奠定的那种文学样式“词”，将成为俘虏他的王朝的第一文学标帜。

人类很多文化大事，都在俘虏营里发生。

这一事实，在希腊、罗马、波斯、巴比伦、埃及的互相征战中屡屡出现。

在我前面说到的凉州到北魏的万里蹄声中，也被反复印证。

这次，在李煜和宋词之间，又一次充分演绎。

十二那就紧接着讲宋代。

我前面说过，在唐代，政文俱旺；那么，在宋代，虽非“俱旺”，却政文贴近。

这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宋代重视文官当政，比较防范武将。

<<中国文脉>>

结果，不仅科举制度大为强化，有效地吸引了全国文人，而且让一些真正的文化大师如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等占居行政高位。

这种景象，使文化和政治出现了一种特殊的“高端联姻”，文化感悟和政治使命混为一体。

表面上，既使文化增重，又使政治增色，其实，并不完全如此，有时反而各有损伤。

第二个原因，宋代由于文人当政，又由于对手是游牧民族的浩荡铁骑，在军事上屡屡失利，致使朝廷危殆、中原告急。

这就激发了一批杰出的文学家心中的英雄气概、抗敌意志，并在笔下流泻成豪迈诗文。

陆游、辛弃疾就是其中最让人难忘的代表，可能还要包括最后写下《过零丁洋》和《正气歌》的文天祥。

这确实也是中国文脉中最为慷慨激昂的正气所在，具有长久的感染力。

但是，我们在钦佩之余也应该明白，一个历时三百余年的重要朝代的文脉，必然是一种多音部的交响。

与民族社稷之间的军事征战相比，文化的范围要广泛得多、深厚得多、丰富得多。

因此，文脉的首席，让给了苏东坡。

苏东坡也曾经与政治有较密切关系，但终于在“乌台诗案”后两相放逐了：政治放逐了他，他也放逐了政治。

他的这个转变，使他一下子远远地高过于王安石、司马光，当然也高过于比他晚得多的陆游、辛弃疾。

他的这个转变，我曾在《黄州突围》中有详细描述。

说他“突围”，不仅仅是指他突破文坛小人的围攻，更重要的是，突破了他自己沉溺已久的官场价值体系。

因此，他的突围，也是文化本体的突围。

有了他，宋代文化提升了好几个等级。

所以我写道，在他被贬谪的黄州，在无人理会的彻底寂寞中，在他完全混同于渔夫樵农的时刻，中国文脉聚集到了那里。

苏东坡是一个文化全才，诗、词、文、书法、音乐、佛理，都很精通，尤其是词作、散文、书法三项，皆可雄视千年。

苏东坡更重要的贡献，是为中国文脉留下了一个快乐而可爱的人格形象。

回顾我们前面说过的文化巨匠，大多可敬有余，可爱不足。

从屈原、司马迁到陶渊明，都是如此。

他们的可敬毋庸置疑，但他们可爱吗？

没有足够的资料可以证明。

曹操太有威慑力，当然挨不到可爱的边儿。

魏晋名士中有不少人应该是可爱的，但又过于怪异、过于固执、过于孤傲，我们可以欣赏他们的背影，却很难与他们随和地交朋友。

到唐代，以李白为首的很多诗人一定可爱，但那时诗风浩荡，一切惊喜、感叹都凝聚成了众人瞩目的审美典范，而典范总会少了可爱。

即便到了晚唐只描摹幽雅的私人心怀，也还缺少寻常形态。

谁知到宋代出了一个那么有体温、有表情的苏东坡，构成了一系列对比。

不管是久远的历史、辽阔的天宇、个人的苦恼，到他笔下都有了一种美好的诚实，让读到的每个人都能产生感应。

他不仅可爱，而且可亲，成了人人心中的兄长、老友。

这种情况，在中国文学史上几乎绝无仅有。

因此，苏东坡是珍罕的奇迹。

把苏东坡首屈一指的地位安顿妥当之后，宋代文学的排序，第二名是辛弃疾，第三名是陆游，第四名是李清照。

辛弃疾和陆游，除了前面所说的英雄主义气概之外，还表现出了一种品德高尚、怀才不遇、热爱生活

<<中国文脉>>

的完整生命。

这种生命，使兵荒马乱中的人心大地不至下堕。

在孟子之后，他们又一次用自己的一生创建了“大丈夫”的造型。

李清照，则把东方女性在晚风细雨中的高雅憔悴写到了极致，而且已成为中国文脉中一种特殊格调，无人能敌。

因她，中国文学有了一种贵族女性的气息。

以前蔡琰曾写出过让人动容的女性呼号，但李清照不是呼号，只是气息，因此更有普遍价值。

李清照的气息，又具有让中国女性文学扬眉吐气的厚度。

在民族灾难的前沿，她写下了“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的诗句，就其金石般的坚硬度而言，我还没有在其他文明的女诗人中找到可以比肩者。

这说明，她既是中国文脉中的一种特殊格调，又没有离开基本格调。

她离屈原，并不太远。

十三在宋代几位一流的文学家，辛弃疾是最后一个压阵之人。

他在晚年曾勇敢地赶不少路去吊唁当时受贬的朱熹。

朱熹比他大十岁，也算是同辈人。

他在朱熹走后七年去世，一个时代的高层文化，就此垂暮。

在我看来，这也许是我心中整个中国古典文脉的黄昏。

朱熹算不上文学家，我也不喜欢他重道轻文的观念。

但是，观念归观念，这位杰出的哲学家对文学的审美感觉却是不错。

哲学讲究梳理脉络，他在无意之中也对文脉做了点化，让人印象深刻。

朱熹说，学诗要从《诗经》和《离骚》开始。

宋玉、司马相如等人“以浮华为尚，而无实之可言矣”。

相比之下，汉魏之诗很好，但到了南朝的齐梁，就不对了。

“齐梁间之诗，读之使人四肢皆懒慢不收拾。

”这种论断，切中要害。

朱熹对古代乐府、陶渊明、李白、杜甫都有很好的评价。

他认为陶渊明平淡中含豪放，而李白则有“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自然美。

对他自己所处的宋代，则肯定陆游的“诗人风致”。

这些评价，都很到位。

但是，他从理学家的思维出发，对韩愈、柳宗元、苏东坡、欧阳修的文学指责，显然是不太公平。

他认为他们道之不纯，又有太多文人习气。

在他之后几十年，一个叫严羽的福建人写了一部《沧浪诗话》，正好与朱熹的观念完全对立。

严羽认为诗歌的教化功能、才学功能、批判功能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吟咏性情、达到妙语。

他揭示的，其实就是文学超越理性和逻辑的特殊本质。

由于他，中国文学在今后谈创作时，就会频频用到“不涉理路，不落言筌”、“羚羊挂角，无迹可求”、“透彻玲珑，不可凑泊”、“水中之月，镜中之像”等等词语，这是文学理论水准的一大提升。

但是，他对同代文学家的评论，失度。

从朱熹和严羽，不能不追溯到前面提到过的《文心雕龙》、《诗品》等理论著作。

那是七百多年前的事了，我之所以没有认真介绍，是因为那是中国文论的起始状态，还在忙着为文学定位、分类、通论。

当然这一切都是需要的，而《文心雕龙》在这方面确实也做得非常出色，但要建立一种需要对大量感性作品进行概括的理论，在唐朝开国之前八十多年就去世了的刘勰毕竟还缺少宏观对比的时间和范例。

何况，南朝文风也不能不对概念的裁定带来局限，影响了理论力度。

这只要比一比七百多年后那位玩遍了一切复杂概念的顶级哲学家朱熹，就会发现，真正高水准的理论表述，反倒是朴实而干净。

十四李清照、陆游、辛弃疾、文天祥他们都认为，中国文脉将会随着大宋灭亡而断绝，蒙古马队的铁

<<中国文脉>>

骑是中华文明覆灭的丧葬鼓点。

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元代的诗歌、散文，确实不值一提。

但是，中国文脉在元代却突然超常发达。

那就是，中华文明几千年的一个重大缺漏，在这个不到百年的短暂朝代获得了完满弥补。

这个被弥补的重大缺漏，就是戏剧。

不管是古希腊悲剧还是古印度梵剧，都在两千五百多年前已经充分成熟。

而中国，不仅孔子没看到过戏剧，连屈原、司马迁、曹操、李白、杜甫、苏东坡都没有看到过，这实在有点说不过去了。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情况，而元代又为什么会改变，这是很复杂的课题，我在《中国戏剧史》一书中有系统探讨。

有趣的是，既然中国错过了两千多年，照理追赶起来会非常困难，岂能料，不知从哪里冒出来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纪君祥等一大批文化天才合力创作的元杂剧。

结果，正如后来王国维先生所说，中国可以立即在戏剧上与其他文明并肩而“毫无愧色”。

此时的中国文脉，在《窦娥冤》，在《望江亭》，在《救风尘》，在《西厢记》，在《赵氏孤儿》，在《汉宫秋》……在这里，我和王国维先生一样，并不是从表演、唱腔着眼，而只是从文学上评价元杂剧。

那些形象，那些故事，那些冲突，那些语言，以及它们的有机组合，在中国文学史和艺术史上几乎是空前的。

是不是绝后呢？

还不好说。

但是如果与明代的传奇——昆曲相比，昆曲虽然也出现了汤显祖这样的作家，写出了《牡丹亭》这样的作品，但放在元杂剧面前，却会在整体张力上略逊一筹。

多数昆曲作品过于冗长、秾丽、滞缓、入套，缺少元杂剧那种活泼而爽利的悲欢。

比《牡丹亭》低一等级的《桃花扇》、《长生殿》又过于拘泥历史，减损了作为一种民间艺术的生命力。

至于清代后期勃发的京剧，唱腔很好，表演虽然没有戏迷们幻想的那么精彩，也算可以，而文学剧作，则完全不能细问。

没有文学就只能展示演唱技能了，在整体上当然不能与元杂剧相提并论。

因此，中国文脉之于中国戏剧，如果以十分计，那么，大概是六分归元杂剧，三分归昆曲，一分归地方戏曲。

京剧已经不是地方戏曲，如果不是从文学、而是从音乐唱腔着眼，它的地位就会不低。

由于元代的统治者是少数民族，一些本该退色的文化也就失去了官方支撑，因此比较彻底地挣脱了文词间的道统气、宫廷气、阿谀气、头巾气、腐儒气，为贴近自然的天籁式创造留出了空间。

这种空间看似边缘，却很辽阔，足以伸展手脚。

由此联想到同样产生于元代的那幅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富春山居图》。

比之于宋代那些皇家画院里的宫廷画师，黄公望只是一个居无定所的流浪卜者，但是，即使把宋代所有宫廷画师的最好作品加在一起，也无法与他相比。

元杂剧的情况也是如此，我们哪怕是把后来京剧从慈禧太后开始给予的全部最高权力的扶持加在一起，也无法追赶元杂剧的依稀踪影。

元杂剧即使衰落也像一个英雄，完成了生命过程便轰然倒下，拒绝有人以“振兴”的说法来做人工呼吸、打强心针。

一切需要刻意“振兴”的文化，都已经与文脉无关。

而且，极有可能扰乱了文脉的自然进程。

现在社会上经常有人忙着要把那些该由博物馆保护的文化遗产折腾到现实生活中来，而且动静很大，我就很想让他们听听元杂剧轰然倒地的壮美声响。

十五明清两代五百四十余年，中国文脉严重衰弱。

<<中国文脉>>

我在给北京大学学生讲授中国文化史的时候指出，这五百多年，如果要找能与屈原、司马迁、陶渊明、李白、杜甫、苏东坡、关汉卿可以并肩站立的文化巨人，只有两个，一是明代的哲学家王阳明，二是清代的小说家曹雪芹。

我们今天所说的文脉，范围要比我在北大讲的文化更小，王阳明不应列入其中，因此只剩下曹雪芹。这真要顺着他说过的话，感叹一句：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

为什么会产生这么惊人的情况？

原因之一，是明清两代统治者实行的文化专制主义已发展到了文化恐怖主义（如“文字狱”）。

这就必然毁灭文化创新，培养出大量的文化侍从、文化鹰犬、文化侏儒。

当然也产生了一些文化叛逆者和思考者，但囿于时间和空间，叛逆和思考的程度都不深。

有人把他们当做“启蒙主义者”，其实言之有过，因为并没有形成“被启蒙群体”。

真是可称得上启蒙的，要等到近代的严复。

原因之二，是中国文脉的各个条块，都已在风华耗尽之后自然老化，进入萧瑟晚景。

这是人类一切文化壮举由盛而衰的必然规律，无可奈何。

文脉，从来不是一马平川的直线，而是由一组组抛物线组成。

要想继续往前，必须大力改革，重整重组，从另一条抛物线的起点开始。

但是明清两代，都不可能提供这种契机。

除了这两个原因外，从今天的宏观视野看去，还有一个对比上的原因。

那就是在中国明代，欧洲终于从中世纪的漫长梦魇中醒了。

而且由于睡得太久，因此醒得特别深刻。

一醒之后，他们重新打量自己，然后精力充沛地开始奔跑。

而中国文化，却因创建过太久的辉煌而自以为是。

欧洲文艺复兴发生在中国的什么时候？

我只须提供一个概念：米开朗琪罗只比王阳明小三岁。

明清两代五百年衰微中，只剩下两个光点，一是小说，二是戏剧。

但明清戏剧我在前面已经作为元杂剧的对比者而约略提过，因此能说的只有小说了。

小说，习惯说“四大名著”，即《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

我们中国人喜欢集体打包，其实这四部小说完全没有理由以相同的等级放在一起。

真正的杰作只有一部：《红楼梦》。

其他三部，完全不能望其项背。

《三国演义》气势恢宏，故事密集。

但是，按照陈旧的正统观念来划分人物正邪，有脸谱化倾向。

《水浒传》好得多，有正义，有性格，白话文生动漂亮，叙事能力强，可惜众好汉上得梁山后便无法推进，成了一部无论在文学上还是精神上都是有头无尾的作品，甚为可惜。

《西游记》是一部具有精神格局的寓言小说，整体文学品质高于上两部，可惜重复过多、套路过多，影响了精神力度。

如果要把这三部小说排序，那么第一当是《西游记》，第二当是《水浒传》，第三当是《三国演义》。

这些小说，因为有民间传闻垫底，又有说书人的描述辅佐，流传极广。

在流传过程中，《三国演义》的权谋哲学和《水浒传》的暴力哲学对民间有严重的负面影响，于今犹烈。

《红楼梦》则完全是另外一个天域的存在了。

这部小说的高度也是世界性的，那就是：全方位地探寻人性美的存在状态和幻灭过程。

它为天地人生设置了一系列宏大而又残酷的悖论，最后都归之于具有哲思的巨大诗情。

虽然达到了如此高度，但它的极具质感的白话叙事，竟能把一切不同水准、不同感悟的读者深深吸引。

这又是世界上寥寥几部千古杰作的共同特性，但它又中国得不能再中国。

于是，一部《红楼梦》，慰抚了五百年的荒凉。

<<中国文脉>>

也许，辽阔的荒凉，正是为它开辟的仰望空间？

因此，中国文脉悚然一惊，猛然一抖，然后就在这片辽阔的空地上站住了，不再左顾右盼。

明清两代，也有人关注千年文脉。

关注文脉之人，也就是被周围的荒凉吓坏了的人。

例如，明代李梦阳、何景明等“前七子”提出过“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口号。

他们还认为“今真诗乃在民间”，例如《西厢记》能与《离骚》相提并论。

他们得出结论：各种文学的创建之初虽不精致但精神弥满，可谓“高格”，必须追寻、固守。

这种观点，

<<中国文脉>>

编辑推荐

《中国文脉》编辑推荐：余秋雨说：“这是除《文化苦旅》之外，我最重要的作品。

”余秋雨教授在很多重要场合一再声明《中国文脉》是一部意义重大的作品，并将其隆而重之地放在余秋雨书系的第一卷，可见其地位之重要，值得关注！

余秋雨教授全新作品，最好看最耐读的中国简明文化史。

《中国文脉》核心篇目《中国文脉》《笔墨历史》，酣畅淋漓地揭示了三千年中国文学的精神主脉，以及作为文脉载体的三千年中国书法史，为余秋雨教授全新作品，此前从未发表过。

在这两个核心篇目之后，是对每个时代文脉的精细论述，组成了一部空前绝后、文采飞扬的《中国文化史》。

按照时间顺序梳理中国文化脉络，深度解读中国文化灵魂。

《中国文脉》以中国文字起源为引，从《诗经》讲起，其间着重谈及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及楚辞，秦汉时期的大一统与书同文对文学的影响，汉赋及“无韵离骚”《史记》，魏晋时期的三曹及“竹林七贤”等文人雅士的诗作文采，再到唐宋诗词，元曲及明清小说，一气呵成，使历史与现实相沟通，文理与形象相交融，揭示了中国文化巨大的灵魂脉络，称得上当下最有文采、最好看的一部中国文化史。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